

CBJ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口述历史分析

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

ON
ORAL HISTORIES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齐小新 著

3
3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口述历史分析

——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

齐小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齐小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

ISBN 7-301-06761-5

I. 口… II. 齐… III. ①口述历史学—中国—近代 ②中美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近代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604 号

书 名: 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

著作责任者: 齐小新 著

责任编辑: 李 颖

标准书号: ISBN 7 301 06761 5/K·03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liy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6.625 印张 172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 言

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中国的新教传教活动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这一段历史,既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又关系到发生在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本书在对一批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历史资源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其中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与美国历史,两国关系史,尤其是口述历史内在的丰富大众文化内容,进行了分析纪录。本书所做的文化研究提出了就特定历史时期展开横向文化比较的问题。美国在华传教活动的兴衰,既有美国国内现代发展的原因,也是这一时期美国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使然。深入了解并分析其具体复杂的内容和原因,我们可以检查问题所在,促进中美对话渠道的开通和发展。

从萌生第一个念头起,到今日成书,前后十几年时间,其间得到许多关心我和此书稿的学者、朋友及亲属的批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有争议,更有这样那样的共同兴趣,这是支持我十几年学习工作的重要精神力量。另外笔者在此对所有口述历史的采访和口述者表示感谢,还要感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达历史协会、利利基金会,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和北京大学的基金和学术调研的支持。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齐小新

2003年北京,雪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编 扩张与应变中的 美国基督教文化:1890—1937

第一章 信仰与利益	27
第二章 家庭和性别价值观	57
第三章 科学与发展	88

第二编 一个美国传教 群体的中国行:1890—1950

第四章 上帝与女权	111
第五章 初级中级教育	125
第六章 乡镇行医	138
第七章 鸡公山	150
第八章 同是难民	165
第九章 最后的日子	177
结语	192
主要参考书目	196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研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建立在对美国文化展开深入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而美国的基督教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乃至核心内容。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文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传统宗教信仰,一是指宗教在与历史和社会发展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大众文化。具体而言,基督教有天主教、新教和正教之分。基督教新教主要分布在英、美、德、瑞士、北欧各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其主要教派有路德宗、加尔文宗、长老会、圣公会、浸会、公理会等。在美国,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不妨看看美国建国以来历届总统的背景——只有 20 世纪 60 年代的肯尼迪总统为天主教徒。当然,作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的正教,在美国的影响就更为微弱了。基督教文化自身深深浸透着的重商情节,是美国大众文化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对于美国基督教文化的这一重要特征,美国一些有较深宗教背景的学术界人士看得很透彻。他们往往会对这一倾向提出批评,同时又多少流露出一种无奈。在这方面,美国史学家劳伦斯·莫尔的分析十分生动深入。在其有关专著的序言中,莫尔首先提到了一个常常令西方人自己困惑不解的现象: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似乎表现得特别虔诚,美国在今天明确表示自己信教或者要常去教堂的人数依然相当多。但莫尔马上就指出,美国的宗教事实上也已经完全世俗化了,因为美国的教会组织,已经与

地方俱乐部或现代语言协会这样的社会教育组织不分彼此。莫尔以不无自我解嘲的意味介绍说：“文化是改进和放松自我的手段，本书研究的是宗教影响如何支配着正在学会购买这种文化的人们的品味。”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迅速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和扩大市场的迫切需求，建立在大众消费基础上的文化应运而生。于是，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化出现了这样的多元层次：一方面是崇尚高雅文化，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以及注重审美思维情趣的美国其他文艺批评家为代表。在这种文化观中，文化是一个绝对不能买卖的概念，文化是一种存在品质，只能通过培养教育，以及提高人的品味和优雅气质来得到。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教育的提高，人类学就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对学术和社会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从人类学定义出发，文化是“如下事物的总和——人类创造的象征系统：工艺品、意识形态和行为符号，人们借此来规划和理解自己的世界”。处于高雅文化和人类文化二者之间的便是消费文化。对文化的大量消费是一个人有文化的保证。这里的消费对象包括艺术、歌剧、芭蕾，以及“五米书架的哈佛经典”^①。

美国历史上这一多元文化情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人们对大众文化日渐强烈的浓厚兴趣，离不开美国政治、经济与宗教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美国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民主政治，构成了将宗教与市场文化联系起来并协调其关系的纽带。市场文化与大众文化反过来推进美国民主进程，并改造美国宗教。商界精英们为了推销产品，以独出心裁的构想和作法将宗教内容融会到广告中。为了维持教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希望，美国的宗教领袖们

^① R. Laurence Moore, *Selling God: American Relig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想方设法借用各种商业手段来推进宗教事业。结果呢,宗教原本最反对通俗娱乐的东西,但在制止不成后索性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变成了与之竞争的商品。“作为一种独立的影响力,宗教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作为一项商品,宗教满足了许多购物者的需要。”宗教努力维护着的独立影响力使莫尔得出的正面结论是,美国新教通过大众文化影响了美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作为商品,宗教无可避免地融会到消费和大众文化之中,如此宗教便“失去了启迪人们心灵的作用”。这种两难的境地最贴切地表现在莫尔的表述中:“如果他们坚持最美好的宗教思想,毫不妥协,他们的教堂就会像许多欧洲国家的教堂那样空空如也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史学家,包括作者自己,都深刻感受到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重要论断的意义:“导致宗教最终破产的世俗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①

莫尔教授的评述为我们揭示了基督教文化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即世俗或大众文化与宗教信仰结合的特征。与此特征密切相关,在国际上,美国基督教文化具有不容置疑的全球扩张性质。其特点是,每一个普通信徒都可能通过教会关系争取到传教士的位置和使命,到世界各地允许其插足的任何一个地方传播上帝的福音,让更多人皈依基督教。事实上,19世纪末叶,在工业化和国家力量各方面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来自“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发动了一场旨在强化基督教影响的社会改良运动,以及旨在将基督教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宗教文化运动。其中,美国各新教教会中的许多传教士们,都将目光投向了那个遥远、神秘、充满无限市场吸引力的国家——中国。传教士们成了基督教徒们心中的榜样和模范先锋。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大批西方基督教

^① R. Laurence Moore, *Selling God: American Relig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Culture*, p.10.

传教士来华频繁活动。在这其中,美国派出的传教士人数远远超出西方其他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美国在中国的新教传教活动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人数有了成百倍的增长,由鸦片战争前后的20人左右发展到这一巅峰时期的4500人,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英国。^①但是很快,进入30年代之后,美国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教活动出现了种种衰退迹象。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时期,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基本成为分散存在的个别行为。大批美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播美国基督教文化,使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关系。如何看待这一关系,是中美双方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课题。

我国史学界曾经有一段时期将传教士活动高度概括为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施行的文化侵略活动。这一定性的自然逻辑便是,所有美国传教士都是美国开展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活动的工具,专门欺压和奴化中国人民。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受到根本的否定。应该看到的是,历史上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确是在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不平等条约背景下展开的,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传教士的殖民特权地位。我国史学前辈翦伯赞对美国传教士做出了如下评价:“他们标榜反对英国炮舰政策来取得清政府的好感,同时利用基督教宣传来灌输美国式的‘文明’,企图从精神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到1876年,由美国教会附设的所谓学堂就已达到294所,目的在于培植为侵略势力服务的传教士和洋行买办。”^②

^①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7, p. 606.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第231页中的统计数字中有“1920年的3919人”之说。笔者在美国也没有看到统一的数字,从教会材料到非教会材料,数字由5000到3000不等。

^②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次印刷,修订本,第359页。

美国早期传教运动内部的大量文献都将传教士表彰为道德最高尚的人,他们不惜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物质生活而千里迢迢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如果有人因为什么原因在中国去世,那就更被看做是为信仰殉难的烈士、所有教徒和国人学习的榜样。在经过 50 年代的一段相对沉闷时期之后,美国史学界在 60 年代,尤其是在中美两国建交之后,出现了对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尖锐批评。有学者用“文化帝国主义者”一词来描述传教士,指出传教士是依靠美国炮舰的保护建立起传教站的,这一时期存在于美中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容忽视,等等。20 世纪末叶的美国史学界已经不再避谈美国在这段历史上的“帝国主义”问题,而是对美国的世界传教运动进行了比较普遍的、不同程度的批评。当然,这些批评依然是以肯定美国的全球影响或自身利益为前提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一方面批评美国外交政策,认为应该关心和同情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时提出美国的确想做中国的保护国,因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腐败落后,无法不被动挨打。费正清这样比较说:“中国总是困难重重,是接受我们的兴趣观点和慈善行为的懦弱一方;美国则总是占据优势,比较顺利,乐于施舍。”^①还有一些人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提出美国人跑到中国去传教,本以为有利于美国自身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结果适得其反。^②

不难看出,中美两方面对传教士批评的出发点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作用。中国方面的批评注重的是传教活动对中华文明发展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强权威胁,而美

^① John King Fairbank,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49.

^② See Charles Vevi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06 - 1913*,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Thomas J. McCormick, *China Market*,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7. 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 - 1921*,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1. Michael Scha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国内许多批评则主要是出于不满美国大资本主义者借助传教活动来搞无限经济扩张。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和商界巨头联合传教士,在攫取中国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同时,只满足了极少数大资产者的利益,而忽视了本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前者的批评不忘传承古老文明的重要,后者的批评不放松经济发展的根本,而两方面的思考和批评都立足于国家利益及其发展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史学界对美国传教士的研究趋向更为深入全面。至 20 世纪末叶,学术发展的结果引发了学者们的某种共识:“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无论做出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极端的。”^① 做出这样一个阶段性结论,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出现的新发展,包括新史料、新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在此特别应该提到新兴的文化研究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宗教文化研究中,有 1991 年由王友三主编的《中国宗教史》,此书以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比较中国整个的宗教历史,做了一个相当全面的分析介绍。1994 年杨天宏的著作《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与文化发展角度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大规模基督教传教活动以及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均做了深入分析和阐发。1996 年顾卫民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就基督教中天主教与新教两大教派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调研材料丰富翔实。^② 与此同时,随着对人文及社会研究的关注和开展,妇女研究学者李小江、朱虹、董秀玉、吕美颐、谭桂林、李银河等,对传教士兴办教育和医疗机构、基督教文化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 180 页。

^② 见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济南:齐鲁书社,1991;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与妇女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当代的妇女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具体分析。^①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具体分析,揭示出丰富的妇女文化内容,其中的有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世纪上半叶传教士及基督徒在中国的社会存在关系、特有生活习俗和价值观。

与此同时,美国对传教士的新认识更多集中在妇女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20世纪美国新教传教士中妇女多于男子,占60%以上。^②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宗教妇女虽然还不被允许当牧师,主要从事的是与女性角色相关的工作,例如相夫教子、医疗护理、幼儿服务等慈善福利和辅助性工作,但她们从基督教的家庭观念以及社会福利工作的重要性的角度提出建议,积极开展了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大计较报酬,不仅改善了社会环境,甚至改变了教会自身的一些传统活动方式以及对圣经的理解。随着关于传教运动的妇女学重要论著的相继问世,妇女史学家们就传教运动中出现的大量妇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妇女还不被教会接受为牧师,但妇女在参加传教的过程中逐渐变革了传教的内在含义。帕垂沙·希尔指出,虽然按照教规妇女不能做牧师,但她们通过教育与医护等社会服务工作扩充了传教的含义,“在宏大的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中,她们不断要求与男子共享管理这一事业的权利。她们的管理权限后来大大超过了照顾妇女和儿童的范

^① 见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谭桂林:《宗教与女性》,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围”^①。佩吉·帕斯科在研究了美国女传教士在美国向其他非基督教徒传教的特点之后指出,活跃于上一世纪之交的美国女传教士们,多少意识到了文化价值的相对性。她们注意到华裔妇女对于性别以及家庭等都有不同于基督徒的理解和认识。虽然来到美国后要在价值观念上进行许多调整,但中国妇女继续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待在美国的处境与问题。她们不愿接受传教士对她们灌输的维多利亚文化价值观念。帕斯科认为,因文化价值不同而不愿接受基督教的情况也出现于美国其他持有不同文化和信仰的社会团体中。她就美国国内传教运动的情况总结说:“虽然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的权利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等的,但双方共同在多种相互关系上建立起历史。”^②

中美新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表明,虽然近代史上的中美国际关系存在重大分歧和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对话基础,那就是对妇女发展事业的共同关心,以及对社会发展中尊重现实的科学教育和社会改良作用的共同关注。从历史发展的背景上看,历史学家罗荣渠在总结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内容时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四个变革因素,它们是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机构衰落的趋势、半殖民地化过程、革命化过程和现代化过程。总的来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我国发生了由封建专制向民主科学方向发展的巨大历史变化。这一历史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积极活跃的社会文化革新意识,包括对传统宗法制的批判,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教育、实业救国的政治主张。从美国传教士的注重妇女发展和积极办学、行医,到中国注重现代教

^① Patricia R. Hill, *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The American Woma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1870-1920*,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p. 4.

^② Peggy Pascoe, *Relations of Rescue: The Search for Female Moral Authenticity in the American West, 1874-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xxi.

育,打开女子、平民和科学教育的大门,这其中不无一定关系,应该说,有很紧密的联系。就某种意义而言,在中国走近世界的过程中,美国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外力推动作用,“中国走上通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①。罗荣渠在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运动形式时指出,随着渐进性与突发性变革相结合的“朝代循环”进入自身衰败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指在世界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内部新兴民族主义勃起,出现经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革命,从而引起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过程”^②。

与中国致力于强国兴民的现代发展的时期大致相同,欧美基督新教提出了“社会福音”(The Social Gospel)的自由主义神学主张。这一主张“盛行于1870至1920年间,在美国流行尤广”。信奉“社会福音”的人认为,“只讲个人得救的福音是不够的,还需传扬改造社会的福音;需将《圣经》所教导的‘爱’和‘公义’的道理贯彻于社会生活中;赞成改良主义,提倡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政治的改革。”^③随着这一自由主义神学的发展,美国的传教运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新现象,那就是,传教队伍中出现了大批妇女的身影。来到中国后,许多美国传教士直接间接地参与到中国的现代社会发展之中,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在中国长期的生活工作中,美国传教士也受到许多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这一熏陶和感染不仅使他们拥有许多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感情,甚至也引发了一些传教士对自身文化乃至信仰的深刻反思。换句话说,美国传教士的确是在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但此后中美两国文化之间发生了重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还发展到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39页。

② 同上书,第241页。

③ 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第563页。

一定程度,并对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的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在经过不少沟沟坎坎之后,再一次迅速发展起来。在此前提下,继续深入审视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美国传教士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美国研究跨学科的角度出发,笔者以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这一段历史,既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又关系到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往来关系。只有这样来看,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美国基督教文化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碰撞的复杂因素。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对美国在华传教兴衰的原因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那一定会对我们展望中美现在乃至未来的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依据。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探究中美之间曾经有过的文化对话基础及其内涵,以及这一文化碰撞的问题所在,就需要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华传教兴衰的原因究竟何在?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课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笔者对于美国在华传教士这一课题所开展的分析研究,最初是由发现一批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传教士口述历史开始的,这就使得笔者的考察和结论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或者说得益于口述历史的调研方法。此外口述历史中收集到的材料以女传教士为多,这也有助于笔者从中加强对妇女文化的研究,并将收获所得融会到对当年在华传教士的整体分析认识当中。这一背景构成了本书对美国基督教文化的研究特点,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局限。笔者所作的有关考察不是建立在中美关系史或基督教史的基础上,而是侧重于中美在特定历史时期横向关系的文化比较;有关考察不是围绕领袖人物展开,而是将一半以上篇幅集中在对一个由普通传教士构成的传教团体的历史描述与分析之上。有鉴于口述历史方法本身就是处于讨论之中的课题,笔者在此就个人

的所得和所用做如下解释。

二、口述历史的意义

什么是口述历史？在欧美，口述历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普通民众。与传统历史调研方法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并非出自上层社会或是名人要人，而主要来自社会各不同阶层。他们也许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但更多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① 口述历史主要表现的是有明显人文个性或地方色彩、有自身突出历史与文化特征的人文社会群体。口述历史的采访和撰写者可以是社区工作者、地方志的编纂者，也可以是历史学家或者自由职业者。口述历史记录下不同社会人文群体针对以其社团生活为中心的历史议题展开的集体回忆，其内容可以与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交汇、交叉，也可以没有直接关系，却有重要社会和历史研究价值。

口述历史资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往往是不见经传甚或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生活与思考。就口述资源本身来讲，它蕴含着丰富的，基于实际生活、良知和普通人思想情感基础上的民间文化或大众文化内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民间或大众文化内容充满着具有重要第一手史料价值的历史知识。口述资源建立在不同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的基础上。某个人文群体的共同回忆被称之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

① 有关口述历史的论述及重要著作，参见 Brown, Cynthia Stokes, *Like It Was: A Complete Guide to Writing Oral History*, New York: Teachers and Writers Collaborative, 1988; Ball, Eve, *Indeh, An Apache Odysse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0, Buhle, Paul, *Marxism in the USA*, London: Verso, 1987。笔者曾著文介绍，《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三期。

ry),也叫“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① 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也可以产生有关过去和现时的知识。”这里的知识指有历史意义的知识,因为蕴含着这些知识的“大众记忆”包含着值得珍视的历史良知:

其中存在着一种有关过去的常识。也许这种常识缺乏一贯性和说服力,但它包含着良好直觉的成分。这类知识通常在没有任何加工的情况下,在日常谈话和个人的比较及陈述中不胫而走。这类知识也许会在一些带着亲情的文化形式中被记录下来,如信件、日记、照相册和与过去相关连的收藏品等。^②

大众记忆可以通过口述表达,以录音方式记录下来,也可以借助多种流散于民间的文化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者往往会拿出自己保存的文字材料及收藏物品等,帮助自己在脑海中唤起回忆的某些内容。

简而言之,口述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有关大众文化的历史,口述历史的产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就口述历史理论提出了如下两个重要论点。

第一,口述历史研究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特别强调“一定要同时成为关注现时的历史学者”^③。他们认为传统历史研究过程被看做是史学家与“他的证据”之间的对话过程。这种史学的致命弱点是把历史事件看成是

① Buhle, Paul, *Marxism in the USA*. London: Verso, 1987, p. 2. Johnson, Richard, Gregor McLennan, etc. eds.,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p. 205-252. 有关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述评,参见拙著《美国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27~134页;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② Johnson, Richard, Gregor McLennan, etc. eds., *Making Histories*, p. 210.

③ Ibid., p. 205.